

## 20世纪以来蒙元军事研究综述

杨玉萍

(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 本文对20世纪以来的有关蒙元军事研究做了较为详细的概括,并对过去研究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做了一定的分析。

关键词: 蒙元; 军事研究

中图分类号: G112:E29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5-5681(2007)01-0149-06

Mongolian Yuan Military Research Synthesi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YANG Yu-ping

Abstract: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Mongolian Yuan military research done in a more detailed summary, research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past problems and done some analysis.

Key words: Mongolian Empire and Yuan dynasty; military studies

元帝国的创建、发展始终是与军事形态的形成、发展、完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蒙元军事的研究对蒙元史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20世纪以来,注意和研究蒙元军事的人颇多,研究四面开花,还就某些重要问题(如怯薛、探马赤军、乱军等)在国际范围内给予了讨论,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本文就其主要成果,按其相近内容大致作一综述。

## 宿卫制和宿卫军

蒙元的军队按照军队的职司作用分为京师宿卫和地方镇戍两大系统。而宿卫又因北方民族和中国的宿卫组织传统不同,分为怯薛和侍卫亲军两个组成部分。

蒙元时期的“怯薛”二字,蒙语为轮番宿卫之义,四怯薛负责宫禁宿卫,在蒙元的政治军事中地位显赫。日本蒙古学泰斗箭内互的《元朝怯薛考》钩沉索隐,详细而慎申地考述了怯薛的组成、职掌、轮番、员数、特权、怯薛长世袭等典制,还提出了《元史兵志》博尔忽早绝,应是“赤老温后绝”之讹,也可怯薛就是第四怯薛,世祖后怯薛轮值不循旧序等见解。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怯薛来自古代蒙古以战士的资格氏族和部落首领服役的自由人——那可儿,其身份相当于亲军或卫士,有首领的庇护赡养,其研究很有启示意义。<sup>[1]</sup>萧启庆对怯薛的由来、性质及其蒙古国和元朝的发展变化等做了进一步的讨论。认为,怯薛是草原游牧社会的产物,它兼有帝王的亲卫、皇家手家务干部、质子营和贵族子弟训练学校等性质。元朝建立后,怯薛原有的大中军的功能已为人数众多的侍卫亲军取代,行政职司大部分丧失,处理皇家事务的权力亦由许多中国式的机构所分享,但它仍为

超乎政府的一个决策团体而存在。在蒙元机构的汉化过程中,怯薛是受汉化影响最少的一个;怯薛又是具有保守性、贵族性、享有许多政治经济特权的集团。<sup>[2]</sup>叶新民对元代四怯薛轮番入值作了新的论断,运用新史料进一步考订,认为以四大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为怯薛长的四怯薛;第四怯薛长的世袭,由于赤老温后代的特殊情况,实际上主要由赤老温家族之外的三大家族来担任,但承袭职任的并不完全是三大家族的后代,“四怯薛”及其番值制度基本附合历史实际;而且从成吉思汗时期一直沿袭下来,但有变化。<sup>[3]</sup>李治安从怯薛“参与御前奏议决策”,“以内驭外,挟制宰相”、“介入宫廷政变及其它皇位更迭”、怯薛预政特征等四个方面对怯薛与元代朝政的关系进行了爬梳,认为:作为蒙古国三大旧制之一的怯薛,不仅是元朝军事宿卫体系的核心,而且构成了长期合法或非合法插手朝政的特殊政治势力,有元一代中央政治始终受到怯薛势力的影响或左右。怯薛预政,渗透着皇帝与怯薛间较强的主从隶属关系,贯穿有元一代,持续不断,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怯薛人员的集团性权力扩张活动。<sup>[4]</sup>片山共夫对怯薛人员的来源和进入怯薛的机会,怯薛执事中负责鹰猪职掌的昔宝赤的地位和作用等进行了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sup>[5]</sup>森平雅彦通过高丽王族参与到蒙古怯薛的事例,对高丽和蒙元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王子加入到大汗的怯薛是最终作为附马坐上高丽王位的必经之路,亦有对忠烈王以后高丽王自己也组织了怯薛这一史实的论断。<sup>[6]</sup>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洪金富在2002年8月12—14日在南京大学召开的“元代政治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元朝怯薛轮值史料考释》一文中对元代部分怯薛轮值日期和次序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订证了史料中

收稿日期:2006-12-25

作者简介:杨玉萍(1980-),女,甘肃天水市人,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 助教。

的讹误:详细考订了“至正廿三年十月十三日,哈刺章怯薛第一日”条,认为是“十月十六日”之误。周良霄、顾菊英认为在蒙古时期,怯薛主要是一种大汗常备的身边护卫军组织,但同时也形成国家行政机构的雏型。蒙古国汗庭的行政机关仅是怯薛组织的一部分。元代建立后,怯薛的行政职能为仿汉制建立的中书省官僚机构所取代。怯薛在军事上的作用大都局限于禁庭轮番宿值,很少用于征战,已由军事组织演变为一个给侍内庭的上层人物的特权集团。作者并从怯薛的组成、职能与权益三个方面给予了考察<sup>[7]</sup>。陈得芝、邱树森等认为怯薛的主要职责在保卫大汗的金帐和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并以大汗亲领作战部队而存在。怯薛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成吉思汗任用的四怯薛长依次是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家世袭担任。诸怯薛各有职分,地位优越,作用在于“制轻重之势。”世祖建立元朝以后仍然沿袭成吉思汗以来四怯薛三日一更、轮番入卫的制度,但第一怯薛由博尔忽改为成吉思汗以自己名义领之,称之为“也可怯薛”。博尔忽后人在元代改领了由赤老温家族领有的第四怯薛。元内廷机构的设立,专司各自职役的怯薛融入相应内廷机构。怯薛制在元代军制乃至官僚体制中都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怯薛军常额保持在一万人以上,最多时曾达一万五千人。<sup>[8]</sup>屈文军认为,怯薛是蒙元王朝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组织,元代高级官员多出身怯薛,怯薛出仕后仍保留原先职务,而且怯薛世职是他们真正身份和地位标志,外廷官称只相当于一种临时的差遣,怯薛是巩固其成员同君主间主奴关系的工具,且怯薛的中枢地位使得蒙古权贵同大汗或皇帝间的主奴观念在整个官僚体制中泛化,所谓的怯薛预政,并不属于非常行为,而是其成员参决政务的合法形式和途径,将这种参政方式看作近侍篡夺中书省权力是在拿中原王朝的政制模式去套其实不一样的蒙元王朝政治结构。<sup>[9]</sup>

元朝初期组建的另一支重要宿卫军——侍卫亲军的研究一直是蒙元军事研究的一个亮点。箭内互认为侍卫亲军的特征是它隶属于枢密院,从一般镇戍军中选拔精锐充任,重在警卫京师。<sup>[10]</sup>萧启庆认为,侍卫亲军的性质与怯薛完全不同。它是世祖沿袭中原中央军事集权“居重驭轻”的传统,也是为保持君主尊严而设置的。其编制来源于蒙古旧制中的万户制,但设置构想、名称及官职都来自唐宋。侍卫亲军军士的成份及待遇与普通军队相同。但与怯薛完全不同,其主要职司在于平衡地方武力。<sup>[11]</sup>20世纪80年代以来,侍卫亲军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井户一公陆续发表了《元朝侍卫亲军的建立》、《元代侍卫亲军的诸卫》,对侍卫亲军的建立过程及汉人军团在蒙元时代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爬梳考论。认为元朝国家政权的军事力量主要依赖汉人军团。<sup>[12]</sup>大叶升一对待卫亲军的统率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指出元廷在制度上对待卫亲军不设独立统率全军的长官是防止形成以侍卫亲军为基础的军阀的重要措施。但中央政府高级官员有效地掌握侍卫亲军的指挥权,使侍卫亲军容易被文、武职区别不明确的蒙古人、色目人的权势家族私有化,最终形成握有侍卫亲军的弄权军阀。<sup>[13]</sup>陈得芝、邱树森等认为,侍卫亲军主要用于防卫以两京为中心的京畿腹地。元朝创建侍卫亲军始于中统元年四月;中统二年五月董文炳改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当已正式建制侍卫亲军之制。至元元年武卫军正式改为侍卫亲军,八年扩为左、右、中三卫。有元一代侍卫亲军不断地扩大,卫设都指挥使或率使,秩相当万户。编入侍卫亲军的有蒙古军、汉军、新附军、色目人军队等。<sup>[14]</sup>周良霄、顾菊英认为,世祖朝接受姚枢建议,创制了源于汉制的武卫军,而最初武卫军是以史天泽与董文炳两大地方势力作为基干的。中统四年(1263

年)十月改武卫军为侍卫亲军,之后不断扩大和增强,由两翼、而三卫、而五卫,至泰定帝时,累增至二十余卫。军人人的除汉人外,还增加了蒙古、色目、新附军等。诸卫职责主要在于拱卫京城,同时有其他众多职司。侍卫亲军在稳定新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制约汉军卫、抵制与镇压北方蒙古叛王中起了重大作用。元中后期,成为弑杀与拥立的重要工具,日益腐化,战斗力丧失。同时,二位对诸卫进行了一定的爬梳。<sup>[15]</sup>史卫民从侍卫亲军的建置沿革和组织结构两个方面对待卫亲军创建、发展、增置与溃亡、人数与各族士兵的比例、各卫屯营地点、建卫方式、军官任用制度、士兵番直制度、粮饷军需的供应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梳理与论断,并列有侍卫亲军建置改易表,文章份量不轻,论述极为精当,参考价值不凡。<sup>[16]</sup>

### 镇戍制和镇戍军

对镇戍制进行全面研究的当数萧启庆。文章具体考察了镇戍制形成的诸因素,镇戍军分布的特殊原则,长期镇戍的原因,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的布防建置。并讨论了镇戍军士轮戍制的不完善给军士造成的经济负担及镇戍制瓦解等问题。对于镇戍的组织,萧先生认为,元代镇戍军的统率系统倾向于地方分权,仅有各地蒙古军直属于枢密院,其他汉军、新附军等皆归行省指挥。元代的镇戍军按照种族差异和征发地区的不同,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乱军等。<sup>[17]</sup>

在蒙古军研究方面,韩儒林主编《元朝史》、萧启庆《元代的镇戍制度》一文都认为,蒙古军是以蒙古人为主体的编制而成的军队。镇戍各地的色目人军队,亦多被列入蒙古军编制。蒙古军主要驻屯在腹里地区,南至河南淮北,北至辽东,还有西北、四川等。灭宋以后,元廷收聚散处南北的蒙古军建立了山东河北、河南淮北、陕西、四川、东北等五个蒙古军都万户府,管辖当地的蒙古军。五万户府又统辖于枢密院节制。黄时鉴对木华黎国王麾下的蒙古军基本史料给予了有力的考证。认为木华黎麾下的蒙古军五部为兀鲁、忙兀、弘吉剌、亦乞剌、札剌儿;五部的人数分别为4000、1000、3000、2000、2000;五部的首领亦分别是:术赤台之子台台;木哥汉札,即蒙格合勒札;按赤那颜,即阿勒赤那颜;李徒,即李秃古列坚;带孙。五部军队都是成吉思汗军队左翼的劲旅,是木华黎蒙古军的主力。五部蒙古军又称五投下或五诸侯,并指出把五部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同时,还对《亲征录》中提到的王孤部和火失勒部给予了考辨,指出《亲征录》中的火失勒即《史集》中的кушикул——忽失忽勒,源自突厥语,意为“联合”。火失勒部千骑确为蒙古军,汪古部万骑亦为蒙古军。黄文论证深刻,份量十足。<sup>[18]</sup>史卫民认为蒙古军“皆国人”,“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料为军”,依十进制编制为十户、百户、千户,“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大部分千户分编在左、右两翼军内,由左、右手万户统辖。蒙古军在攻金、灭夏、西征、征宋的长期战争中,其生力军消耗巨大。北疆的蒙古军在元廷与东北、西北蒙古诸王斗争中伴演了重要角色。<sup>[19]</sup>

20世纪以来,对探马赤军的研究最有成就,也最深入,较为全面,起步亦早。

白鸟库吉、伯希和认为,辽代的“挾马”是“探马赤”的最近语源,唐代的“答摩支”是其最早语源。“挾马是扈从之义”。<sup>[20]</sup>岩村忍认为,探马赤可能是由蒙文Tamgaci转来的,Tamgaci为蒙文烙印、印章之义。<sup>[21]</sup>荻原淳平认为,探马赤军的语源有二:一是蒙语Tama意谓“收集”;二是蒙语Tamaga烙印、印

章。探马赤军即“收集那些有烙印的探马赤(隶属民)而组成的军队。”<sup>[96]</sup>海老泽哲雄认为,探马原是具有侦察敌情的骑马兵意义的汉字,后来可能传入北方民族作为他们的借字,其涵义随之扩大,变成具有先遣部队性质的先锋。<sup>[97]</sup>乌恩认为,“探马赤”一词源于蒙古族的狩猎术语Tama(意为包抄围拢迂回)。探马赤一词就是Tama和Ci两词的组合同义,起初表示狩猎中承担包抄围拢野兽的人。探马赤军即是在战争中充当先锋,承担迂回包抄任务的特种部队。<sup>[98]</sup>箭内互认为,探马赤军是由蒙古人以外的各部族(主要是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人员组成的。<sup>[99]</sup>村上正二、护雅夫共同认为,探马赤军是投下领地所属军队,其构成以部族为单位,自成一体。组建探马赤军,是一些身为开国元勋的蒙古部族独有的特权,探马赤军作为私属军队,与中央政府直属的蒙古军、汉军完全不同。<sup>[100]</sup>荻原淳平主张,探马赤军是由地位低下、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隶属民组成。该军队的成份决定了其先锋、镇戍的职司。<sup>[101]</sup>大叶升一支持荻原先生的观点,并认为探马赤军当包括木华黎指挥的军队、绰尔马罕军团、合失迷儿镇守军等。<sup>[102]</sup>

贾敬颜从探马赤与探马赤军、五部探马赤军与五投下、探马赤军的将官们、探马赤军的士兵等四个方面细致入微地进行了考察探讨。认为,伯希和对探马赤一词的解释适当。探马赤一词源于突厥语“答摩支(对音tampmaci;tamaci)”契丹语挞马(tama),先为扈从之官,后为先锋之士。探马赤一词又与“阿勒斤赤”一词有关。阿勒斤赤为“头哨”或“哨望”。探马赤军是先锋军、远征军和先遣队,是征伐与屯戍边远地区受辛苦的重役军,是从千户、万户中抽取出来的精锐之士。探马赤军由“诸部族”组成,而“诸部族”包括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但军中骨干和核心始终为五“部族”蒙古人,即兀鲁兀、忙兀、弘吉剌、乞乞烈思、札刺儿五个部族。<sup>[103]</sup>杨志玖就探马赤军的部族、探马赤的释义和对音、组成、征用、扰民进行了精细有力的论述。认为,早期的探马赤军由五部族组成,扩大后的探马赤军则扩进了汉人、色目人,但仍以五部族为核心;探马赤即汉语“探马”之意,是先锋军,探马赤二探马是蒙古语尾赤二阿勒斤赤。探马赤军组成核心是五部族,主要用于征伐、镇戍和宿卫三方面;但探马赤军也造成了扰民。<sup>[104]</sup>并对荻原淳平《木华黎国王麾下探马赤军考》文中有关论据观点进行澄清商榷。认为选五部为探马赤军是因为五部骁勇善战,可以打先锋,而非荻原先生所言它们属于隶属民。探马赤军是一个杂牌军,不可能是同一部族之人。“投下”是成吉思汗的“投下”。探马赤军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阶级,而是分成若干阶层。<sup>[105]</sup>荻原淳平对杨志玖先生质疑给予了答复。<sup>[106]</sup>杨氏又一次对探马赤军的组成、五投下与五投下探马赤军、探马赤军在蒙古军中的地位 and 作用,探马赤部将表诸方面进行了考镜探研。主张,探马赤军最初是从蒙古诸部族中,具体地说是从诸部族中的千户和百户中抽调出来一定的人数组成的军队。五投下与五投下探马赤既有区别又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探马赤制度是蒙古中央集权在军事制度上的一种表现。探马赤的组成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原来部族首领对其直属部族军的权力,使军队的部酋分属制变成君主直辖制,加强了皇权。各支军队随同主帅出征及诸王封地内设探马赤军,是对诸王军权的分割和对诸王的监视。同时,先生对英国蒙古史学家杰克逊(P.Jackson)和法国蒙古学家欧班(Jean Aubin)关于探马赤军的研究给予了关注。并列有内容详尽的探马赤部将表,有助于理解有关探马赤军人和事等方面,提纲挈领,一目了然。<sup>[107]</sup>可以说杨氏三文都极有份量。黄时鉴认为,1217年最早的探马赤军组成

是从兀鲁等五部蒙古军中抽出了一部分,加上了汪古部万骑。最早的探马赤军是蒙古军,也是“诸部族军”。<sup>[108]</sup>邱树森等认为,蒙古最早组建探马赤军在一二一七年木华黎受命率军经略华北之时。当时是从兀鲁等五部蒙古部中抽调人马编成,与五部合为“十军”;是从千户和万户中抽出派到某地长屯戍的军队,地位低于蒙古军,故专用作远征和远戍的头哨部队、重役部队。关于探马赤一词同意伯希和观点。扩大的探马赤军还包括畏兀人、北方汉人等民族成份。其防卫重点主要是腹里地区,南到河南淮北,北至辽东,还有西北、四川等地。保罗·布尔勒认为,探马赤军是蒙古在中国统治的真正基石,促使忽必烈建立了或承继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统治制度——中央集权机制与探马组织,对帝国的政治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探戈赤是探马赤的变种而已。<sup>[109]</sup>

## 乱军

蒙元时期的乱军,是蒙元史家长期关注的另一个课题。新史料的不断发掘,使其研究得到不断的深入。王国维开研究乱军之先河,他认为“主因”一语乃“乱军”之对音;辽金元三史中之“乱”字,其或作“乱”者乃“乱”字之省,其音当读“居黝反”,其或与主、竹、敌、迪等字相通用者,乃其讹变之音。<sup>[110]</sup>陈述认为,乱是契丹字,音查,义为黑色,同时具有黑旗,旗下之人,乃至旗或军的意思。<sup>[111]</sup>贾敬颜同意大师王国维的观点,并指出,乱军是由边防上居住的部族或部落组成,是用部族或部落的名称作“乱”的名称的。<sup>[112]</sup>蔡美彪主张,辽金元三代之乱与乱军,经历了逐步演变的过程,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内容。乱是辽、金、元时代契丹、女真和蒙古语中一个专用的词汇,汉文文献中的乱是它的译名,音读如札或察。本义有“杂户”、“杂类”之义。契丹、女真、蒙古统治者用以泛指杂居的外族分子。辽代契丹所称乱主要指北方边境俘降的各族分子,不包括汉人和渤海。金代女真所称乱指北方各族的俘降分子或流散分子,不包括汉、渤海和契丹。蒙古所称乱,复数形为札忽惕,初期称谓汉人、唐兀等其他各族分子,但随着领域的扩大和各族人的增多,乱的含义又逐渐缩小,限于南人以外的汉族人以及与汉族杂居的非色目的各族人。蒙古建国时期札忽惕诸军包括了金朝以至西夏的各族军,元代称乱为汉,蒙古所称之乱军演为以汉族为主的汉军。只是在辽东地区,由于特殊的背景,沿袭了乱军的名号和金代的旧制。<sup>[113]</sup>黄时鉴认为乱军的出现始自辽代,辽亡金兴时部分乱军归金,部分北走。蒙古兴起时,北走乱军归了成吉思汗,附金乱军不少亦叛金归了成吉思汗,成为灭金的一支重要力量。诸乱之一的汪古部投蒙古后,被木华黎分编入探马赤军和契丹、女真、汉军中,致使其在元代后来文献中消亡。<sup>[114]</sup>邱树森等亦认为乱军最早出现于辽代。金仍辽制,把在北方守边的诸游牧部众编为诸乱和乱军,称之为“生蕃”或“杂人”。札兀惕即为乱字复数形式的蒙古语音。札兀惕一词后来被蒙古人专用来指金以及旧金故土的居民(“汉人”)。蒙古势力壮大后,附金诸乱降蒙古。元朝,诸乱大都融入到其他军队去了。只有辽东若干地区,作为乡兵的一种,仍保留着乱军这一专名。

## 汉军

二十世纪以来,汉军的研究不断地深入,新的史料亦不断得以发掘。唐长孺、李涵就七万户所包括之人及权势、与蒙古统治者的关系,以及七万户产生、发展与衰落的历史条件、作用等方面作了详尽全面的考察。认为,金元之际汉地

七万户为刘黑马、萧札刺、史天泽、张柔、张荣、严实、李璫；他们都是割据一方的世侯，其中以史天泽、张柔、严实、张荣、李璫五万户最典型。他们既是一路的军事长官又是民政长官，掌握生杀大权，有自行征收赋税之权，且是世袭的，汉地万户对蒙古统治者有出兵从征和纳贡赋的义务，享有对当地的统治权。但二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利害冲突，世祖朝开始采取设立十路宣抚司和把民事与民政分开等措施剥夺万户之权。汉地诸侯产生、形成是与金末汉族地主武装兴起；木华黎所率兵力不足，必须借助汉族地主武装，况他们已形成割据势力；在经济上他们的存在利于恢复当时生产，向蒙古统治者提供贡赋，其存在与蒙古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分不开的。汉军万户对帮助蒙古统治者攻城略地、灭金亡宋、建立对中原乃至金国的统治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其本身的落后，在经济上对人民的剥削十分严重，加深了地方政治的腐败与黑暗。元统治的稳固必须取消汉地万户的权力。<sup>[43]</sup>黄时鉴对唐、李两位先生的文章进行了质疑，认为“早在成吉思汗时就已设立两个汉地万户”、“窝阔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重新任命了三个万户”的论断是不可取的。新增四万户中不是李璫而是塔不已儿，严实、张柔、张实列万户在1232年。汉地七万户并不简单代表或包括汉族地主或汉人世侯问题。汉军万户设置乃是蒙古万户制度在山后和中原地区的延伸，直接目的是为了征金伐宋战争的需要。窝阔台时期在广义汉军中，契丹军与狭义汉军之间有明显的消长趋势。<sup>[44]</sup>王頊认为，成吉思汗时存在的汉军万户仅为金之旧制，官品低卑，性质上也区别于后来。窝阔台初期，因镇戍中原汉地和高丽战事建立了刘黑马、萧札刺、史天泽、王荣祖、移刺买奴五个万户，是将“世侯”武装改编为蒙古国“国家武装”的一种尝试。出于灭金战争需要，窝阔台于1232年增置四个新万户为：塔不已儿、张进、郭德山、另一姓名不明。灭金后，为酬赏军功和灭宋战争需要，窝阔台先后以直接改编“世侯”的武装和签发兵士的方式新建万户。张柔、严实及夹谷留乞等万户就是在此条件下制定的。军籍的分立使万户制度进一步充实加强，并使之成为蒙古“国家武装”统一的高级军事单位和不论民族出身的“千户”之上的军职。<sup>[45]</sup>史卫民指出元代的汉军来自以下四个渠道：金末汉地地主武装，来降的各种金朝军队，降蒙宋军和自窝阔台以降的中原签军。汉军在对金宋战争、镇戍江南、保证国家统一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sup>[46]</sup>大叶升一认为，由于经济负担过重，汉军逃亡严重，很难保持十进位编制的兵员数目。后来元廷实行独军户、正贴军户制以调整军需负担，汉军万户、千户、百户的实际户口一般可以遵守十进位制的规定数目。<sup>[47]</sup>台湾学者孙克宽汉军的主要将领史天泽、张柔、董俊三家族作了系统的研究。<sup>[48]</sup><sup>[49]</sup><sup>[50]</sup>胡小鹏指出，窝阔台汗已丑年始置汉军三万户中之萧札刺，不是萧也先之子萧查刺，而是甲戌年投降蒙古的金中都乱军首领札刺儿。增立四万户的时间在甲午年而非壬辰年。汉军三万户与七万户的设立都与蒙古忽里台大会的召开有关。甲午年增立的七万户，汉人有刘黑马、史天泽、严实、张柔、契丹人有萧札刺之子重喜、塔不已儿、石抹孛迭儿。汉军万户的设置是按蒙古军制，重新编制汉军是为了便于指挥。<sup>[51]</sup>

### 军户和奥鲁制

蒙古统治者进入汉地后，制定了带有征兵制性质的军户制。对军户的研究也是蒙元军事研究很重要的方面。大岛立子较早地考察了与汉军户相关的若干问题，先生以通过汉军军户透视元廷统治汉人的政策为目标，探讨了汉军军户的选定标准、世袭、入社和免税粮科差等对待。指出，元廷虽实行

按职业等分定户计的制度，但军户和民户并无身份、阶级的差异。从至元末到成宗朝，中书省系统的民政官受重视，军户常承受军役和差役双重负担，从而损害了汉军军户制和元廷的户籍分离统治体系。<sup>[52]</sup>陈高华从军户的签发、管理制度、军户的封建义务、军户制度的弊病等方面予以了详尽周全的阐述。认为，元代军户并不局限于汉军户，还包括蒙古军户、探马赤军户、新附军户等。来源不同，管理方式亦不同。元廷制定了有关应役、赋税等义务，制定了汉军的正贴军户制，蒙古军探马赤军的军驱制以及军户轮换、给养输送等一系列规则，力图保持军籍军户的稳定和朝廷的严格控制。指出，元代军户制的优点是军士来源较稳定，军户多自行供给，有利于多养兵和减轻财政负担。军户制内的弊端和矛盾是封建政治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表现。<sup>[53]</sup>邱树森等认为，元朝诸色户计中军户受到政府亲睐，军户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蒙古军户包括编入蒙古军中的色目人户。汉军军户来源有二：一是经过改编的金朝军队和华北地主武装；一是蒙古政权和元政府在北方新签发的军队。签发汉军一般都取中户。新附军户没有贴军户。对军户的管理是通过奥鲁系统实现的。<sup>[54]</sup>顾菊英、周良霄认为，在窝阔台八、九年（1236—1237年）史天泽奏后，方有军、民户之分。军户不负包银、丝料、俸钞等科差。北方的军户，景况远优于民户。<sup>[55]</sup>

奥鲁是蒙古语ahurug的音译，《秘史》称“老小营”。它是管领蒙古军、探马赤军与汉军军户的组织，是军户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岩忍村是较早考察奥鲁制的蒙古学家，他同意白鸟库吉先生的奥鲁即故乡的观点。主张奥鲁起初是指军士的出身地。奥鲁制具有征募军士，提供给养等两重意义。具体地说，奥鲁行使屯田、调查户口、签军、补充兵员、存恤家属、课税、输送给养等职能。由于这些经济职能越来越重要，奥鲁的民政色彩愈显浓厚，这也成为后来奥鲁多由地方管民官兼任的原因之一。<sup>[56]</sup>村上正二对元朝的奥鲁一词给予了考述，同时对奥鲁制度做了较全面的论断，极大地促进了这一研究进程<sup>[57]</sup><sup>[58]</sup>。陈高华对奥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指出，元代的奥鲁有两种涵义：既指军人族属，又指管理军人族属的机构；元朝建立后，奥鲁的管辖也不统一，蒙古军、探马赤军的奥鲁由军队自行管理，汉军奥鲁则由地方官兼管。<sup>[59]</sup>

军官军士的侍从及军驱，是草原游牧社会的产物，是研究元代军制中十分重要的课题。阔端赤(ködölci)掌从马者(随从)，是军官军士侍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白鸟库吉、箭内互均认为阔端赤为引导人和侍从。<sup>[60]</sup><sup>[61]</sup>韩儒林对阔端赤作了专考。认为阔端赤一词由koötel或kötöl孳乳而出，意为牵，对音是kötölchi或kötölchi。原意为牵从马者，在元代则是为军士掌管从马或牧养马驼的从人，其身份概为驱口。<sup>[62]</sup>

姚家积认为元代虽无“驱军”之名，却有“驱军”之实。色目诸卫军主要是放免的色目俘虏组成的。元后期，军驱代役十分普遍。包括蒙古军、探马赤军在内的各种军队，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驱军”的性质，这是元代军制的一个重要特点。<sup>[63]</sup>

### 牌符军官制度

有元一代，军将均佩带牌符以彰武职。箭内互先生是最早研究牌符制的蒙古史家。他详细考察了元代军将牌符的由来、种类、等级佩带资格、牌符外型、佩带方式和发放等；并指出，元代的金虎符，名为符，但并无割半合的构造，仅是单独使用的虎头牌。<sup>[64]</sup>丁彦博、苏继顺对元朝佩带的“虎头金牌”常被西方学者称为“狮头金牌”进行了讹误考辨。指出讹误在于波期语sēr的一词两义，云虎亦云狮。况西方人最崇狮，虎的地位远逊于狮，故他们将《史集》等文献中的sēr误训

为狮,乃是囿于自身习俗而为。<sup>[65]</sup>蔡美彪对元代军官牌符问题有颇深的阐述。他认为,元朝各级军官按照不同等级佩带牌子,以表示其身份、地位和权力,这类牌符由朝廷统一颁发。军官在升降或去职时,要按制度“倒换”或交还。世袭军官则可以“子孙袭替”。<sup>[67]</sup>李晓非对新发现的元代金牌以及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元代牌符做了较全面的介绍,对元代的牌符制度、功用、管理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sup>[68]</sup>

大叶升一对元代军官的权限进行了考述。认为,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军队是按十进制编组的。蒙古帝国时代的千户,很多是部族组织的沿续,千户长拥有直属的百户,百户长拥有直属的十户。这意味着指挥官拥有亲卫队组织,其封建领主的性质遂得以顽固地保留下来。而且,在元朝军队组织官僚化的情况下,至少汉军是遵循成吉思汗规定的上述军官权限的。<sup>[69]</sup>

### 其它军队的研究

其它军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一是关于质子军的研究。李治安从质子军的人员构成、职司、户籍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元代的质子军主要是蒙古时期从河南、河北、山东等被征服地区的将校或自身富户子弟中签发来的。一般不入宿卫,多执行征伐、镇戍等职司,并有封建义务和相应的编制及管理机构,是一支特殊的军队。<sup>[70]</sup>史卫民认为,秃鲁花军是最早出现的同种身分军队。秃鲁花原意为“散班”或“宿卫”,是怯薛的一种。秃鲁花是随被征服民族人质散班转义为质子,故由质子组成的军队称质子军。成吉思汗时已有质子军,质子军随着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稳固,尤其是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的确立,依靠质子进行控制的办法逐渐过时,质子军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逐渐销声匿迹了。<sup>[71]</sup>

二是关于新附军的研究。王晓欣认为新附军来自南宋军,由于南宋军队的名称十分繁杂,故元史料中对新附军亦有多种称法,如生熟券军、通事军、手号军、涅手军、手记军等。元攻宋时对降军采取了分隶各部、放散、继续由南宋原守土官领戍的办法,由于安置不适,之后又采取招诱、拘刷、调动整编的方式按元朝军队的形式组建了新附军。指出新附军在元军各系统都有分布,在中央成为侍卫亲军的一部分,在地方又是镇守万户和新附军万户。新附军官在部队中充当各种职务,但一般不掌握真正的实权,却享受高官厚禄。在袭替转上同于其他各军。新附军人的户籍与后勤管理较部队组织情况要复杂得多。元依靠国家强权把新附军纳入军户制体系,但亦有募兵制存在。新附军人多是只身,新附军户仍保持南宋募兵制的特点,但同时负担杂泛差役和缴纳地税;新附军无奥鲁,军户随军或留于地方。故其最终变成了一种即非募军又非征兵的混合物。新附军是元统治者对内镇压对外侵略所利用的工具,新附军除了出征镇戍外,还承担着大量的屯田和各种工役任务,是元代诸多矛盾在军队中的集中体现,是南宋制度和元制的混合。<sup>[72]</sup>顾菊英、周良霄认为新附军是收编南宋军队,包括生券军、熟券军、通事马军人等。原招募,后累行招编;新附军人无贴户,不享有贍军地四项不纳地税的优待,多孤寒一身,有妻者亦少,或仅有妻子而无产业<sup>[73]</sup>。史卫民亦认为,新附军由南宋投降元朝的军队组成,又称作新附汉军或南军。南宋降军名号繁杂,象生券军、熟券军、手号军(又作手记军、手号新军、涅手军)、盐军、通事军等名称都被元朝所采纳。元统治者对新附军的安置,先广为招集,确立军籍,后分编到其他军队中去。由蒙古、色目和汉人将领统率用于对外战争,尤其是征日本和爪哇的战争。不参战的新附军主要从事屯田和工役

造作。<sup>[74]</sup>

此外,对元朝军队中的水军以及由回回炮手军匠和火炮军匠组成的专门部队“不出他方”的乡兵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迭出。

### 20世纪以来蒙元军事研究回顾与展望

20世纪以来蒙元军事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有箭内互《蒙古史研究》,萧启庆《元代军事制度》、《元代史新探》、《元朝史》、《元代史》这样一些极有份量的皇皇大作问世;有如箭内互、萧启庆、邱树森、陈得芝、杨志坎、周良霄、符拉基米尔佐夫、陈高华等这样一些蒙古学、蒙元史家为之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并有一批新的学者如史卫民、王晓欣、瞿大风为之追求,相信蒙元军事研究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更为巨大成就。在元代军事研究中怯薛制、探马赤军、侍卫亲军、汉军万户、军户与奥鲁、征服战争等研究渐趋成熟,成果很多而且都份量不轻。但并不是说这些方面研究没有留下空白,总体性的研究欠少,怯薛中可争论的疑点多;探马赤军的编组、军籍、东西方探马赤军的异同、探马赤军与蒙古军的关系,与原抽调单位的关系及探马赤词源语义都还需进一步研究澄清;侍卫军研究、蒙古军研究需进一步挖掘史料,系统地推究两军的编制、运行、保障兵源诸方面众多问题;汉军万户研究中汉军将领还未彻底统一,汉军的其他问题如汉军的最早创编汉军万户的演变过程,元廷对其的政策等都有待深入。

军户与奥鲁研究虽取得了如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岩忍村《元朝奥鲁考》,村上正二《元朝兵制史正的奥鲁制度》这样一些重量级的研究成果。但仍有许多余地可察,如军户的特点、来源、重要作用、影响、管理、类别、奥鲁的词源语义、奥鲁与军户制的关系等尚待深察。

乱军研究成果的确不蜚,但乱军争议未定,乱军内部组成、元乱军与辽金有何关系、乱军在元军事中的地位等仍需深究阐述。

其他如军人侍从、军驱、军制、乡兵、新附军、特殊军种、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军事机构的研究空白很多,有许多的史料有待发掘,尤其是这些方面的研究尚处于初期,研究空间很大,有待志于此研究的学者深入研拓,相信能够取得喜人的成果。

总之,蒙元时代的军事是蒙元时代的特征,也是蒙元时期珍贵的财富,研究蒙元的军事,就揭开了蒙历史奥秘神圣的一页,证实了蒙元历史尤其是其在军事方面的价值和历史的贡献。

### 参考文献:

- [1] (苏联)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三章第一节[M].刘荣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 [2][11]萧启庆.元代的宿卫制度[A]/元代史新探[C].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3]叶新民.关于元代的“四怯薛”[J].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
- [4]李治安.怯薛与元朝政[J].中国史研究,1990,(4).
- [5]片山共夫.关于元朝怯薛出身者的家世[J].关于元朝的昔宝赤——以怯薛的二重构造为中心[J].东洋史论丛.九大·文,1980:8.12.
- [6]森平雅彦.元朝怯薛制度与高丽王族[J].史学杂志,2001:110-2.

- [7][15][55][73]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36-443.
- [8][14][54]韩儒林主编.元朝史[M].人民出版社,1986.
- [9]屈文军.元代怯薛新论[J].南京大学学报,2003,(2).
- [10]箭内互.元朝怯薛考[J].蒙古史研究,刀江书院,1930.
- [12]井户一公.东洋史论集[C].九州大,1982,(10),1983,(12)
- [13][47][69]大叶升一.蒙古帝国元朝的军队组织[J].史学杂志,95编7号.1986.
- [16]史卫民.元代侍卫军建置沿革考述[J].元史论丛,第四辑[C].中华书局,1992.
- [17]萧启庆.元代的镇戍制度.元代史新探[M].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18][36][42]黄时鉴.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C].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
- [19][46][71][74]史卫民.元代的军队[J].文史知识,1985,(7).
- [20]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C].史学杂志.24编1号.1913.
- [21]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M].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5编[M].商务印书馆,1995,又见于《辅仁学法》三卷一期.
- [22]岩村忍.五户丝与元朝的地方制度[J].东方学报(京都)32册1962.
- [23][29]荻原淳平.关于木华黎国王麾下的探马赤军[J].东洋史研究,36卷2号.1977.
- [24]海老泽哲雄.元朝探马赤军研究序说[J].史流,7卷.1966.
- [25]乌恩.“探马赤”词源新释[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1).
- [26]箭内互.元代的官制和兵制[J].蒙古史研究,刀江书院,1930.
- [27]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J].蒙古学报,1940,(1).
- [28]护雅夫.探马赤部族考序说[J].史学杂志.55编1号,1944.关于元初探马赤部族[J].北亚细亚学报,3卷,1944.
- [30]大叶升一.元代的探马赤军——探马赤军的构成内容及部属[J].蒙古研究.15卷,1984.
- [31]贾敬颜.探马赤军考[C].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
- [32]杨志玖.元代的探马赤军[C].元史论集.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4;元史三论[M].人民出版社,1985.
- [33]杨志玖.探马赤军问题再探[J].民族研究,1981,(1).
- [34]荻原淳平.再论木华黎国王麾下的探马赤军——答杨志玖氏的批判[J].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3,(3).
- [35]杨志玖.探马赤军三探.元史三论[M].人民出版社,1985.
- [37](美)保罗·布尔勒.蒙古帝国探马赤军的社会作用[J].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3,(3).
- [38]王国维.<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C].致藤田博士书一[C].致藤田博士书二[C].观堂集林,卷十六[C].
- [39]陈述.辽金元的乱军[N].光明日报,1951-02-03.
- [40]贾敬颜.乱军问题刍议[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1).
- [41]蔡美彪.乱与乱军之演变.元史论丛,第2辑[C].中华书局,1983.
- [43]唐长孺,李涵.金元之际的汉地七万户[J].文史,第11辑[C].中华书局,1981.
- [44]黄时鉴.关于汉军万户设置的若干问题.元史论丛,第2辑[C].中华书局,1983.
- [45]王頊.蒙古国汉军万户问题管见.元史论丛,第4辑[C].中

华书局,1992.

- [47][69]大叶升一.蒙古帝国元朝的军队组织——特别是指挥系统和编组方式[J].史学杂志,1986.95:7.
- [48][49][50]孙克宽.元代汉军永清史氏本末——元代汉军三世家考之一[J].大陆杂志,20:4.1960.元初汉军张柔行实考[J].东海学报,4:1.1960,元代汉军董城董氏本末[J].东海学报,1960.9:2.
- [51]胡小鹏.窝阔台汗己丑年汉军万户萧札刺考辨——兼论金元之际的汉地七万户[J].西北师大学报,2001,(6).
- [52]大岛立子.元朝对汉族统治的一个考察——以军户为中心[J].史论,东京女子大学,1971(23).
- [53][59]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元史论丛,第1辑[C].中华书局.1982.
- [56]岩村忍.元朝奥鲁考[J].北亚细亚学报,1942,(1).
- [57][58]村上正二.元朝奥鲁原义考[J].史学杂志.54:7.1943.元朝兵制史上的奥鲁制度[J].东洋学报,30:3.1943.
- [60][61]白鸟库吉.高丽史中蒙古语解释[J].东洋学报,1929.18:2.箭内互.元代怯薛考[J].蒙古史研究,刀江书院,1930.
- [62]韩儒林.元代阔端赤考.穹庐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63]姚家积.元代的“驱军”和军驱[J].中国史研究,1985,(1).
- [64]箭内互.元朝牌符考[J].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9.1922.
- [65][66]丁彦博.元代虎符考[C].中华文史论丛,4.1963,(4).苏继庠.虎头金牌与狮头金牌[C].中华文史论丛,1963.
- [67]蔡美彪.元代圆牌两种考释[J].历史研究,1980,(4).
- [68]李晚菲.新发现元代金牌及元代牌符文献研究[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12).
- [70]李治安.元代质子军争议[J].历史教学,1988,(5).
- [72]王晓欣.元代新附军述略[J].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2,(2).

[责任编辑 张 科]

[责任校对 周振兴]